

# PM2.5、知识生产与意指概念的阶层性批判： 通往观念史研究的一种修辞学方法路径

刘涛

## 摘要

如何把握观念史研究特别强调的观念起源、存在形式及其历史过程，知识社会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路径，其方法论上的操作基础就是探讨“观念的社会影响”“观念的生成机制”和“观念的群体意识”。作为一种被科学话语精心构筑的意指概念，PM2.5的“出场”意味着一场深刻的知识赋权行为，人们得以通过对PM2.5的识别来把握雾霾及其环境观念。然而，秸秆焚烧事件打破了城市话语和乡村话语长久以来的对话关系，PM2.5深层的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均呈现出明确的阶层属性。PM2.5议题分析过程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观念史研究的修辞学方法路径，具体表现为对六大修辞命题——修辞资源、话语形式、框架形态、接合机制、修辞实践和阶层批判的识别和分析。

## 关键词

PM2.5、观念史、知识社会学、意指概念、秸秆焚烧、接合实践

## 作者简介

刘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电邮：oliutao@126.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环境传播的公共修辞与符号化治理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7BXW008）的研究成果。

## PM2.5,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Class Criticism of Ideographs: Searching for a Rhetorical Approach to History of Ideas

LIU Tao

## Abstract

Sociology of knowledge, by examining the social impacts of idea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ideas, and the group consciousness of ideas, provides a useful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ideas, which emphasizes the origin, pattern, and historical process of ideas. As a type of ideographs elaborately constructed by scientific discourses, the emergence of PM2.5 symbolizes a far-reaching knowledge empowerment. It was through the identification of PM2.5 that people are able to recognize haze as well as the environmental idea. However, The Jie Gan Fen Shao Events (or Straws Burning Events) has undermined the dialogues between urban discourses and rural discourses. Both discursive practice and sociocultural practice of PM 2.5 present distinctive class attributes. This study provides a rhetorical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ideas, including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six rhetorical perspectives: rhetoric resources, discursive forms, frameworks, articulation, rhetoric practice, and class criticism.

### Keywords

PM2.5, history of idea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deographs, Jie Gan Fen Shao Events, articulation

### Authors

Professor Liu Tao works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in Jinan University. He is also a researcher at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Center in Fudan University. Email: oliutao@126.com.

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 No.: 17BXW008).

## 一、问题提出：观念史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路径及其方法论问题

观念史 (history of ideas) 研究早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就已经诞生, 然而真正将观念史从哲学史中剥离出来的学者则是二十世纪初美国哲学家阿瑟·洛夫乔伊 (Arthur O. Lovejoy) (Diggins, 2006)。如何确立观念史的研究对象? 洛夫乔伊立足于分析化学思路, 强调从伟大的学说体系中离析出来一个个具体的“观念的形式”——“单元-观念” (unit-idea),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哲学研究。“单元-观念”具体体现为一些不同于各种思潮、主义或体系的思想形式或知识单元。它们自由地穿梭于不同的思想体系, 甚至“穿越全部历史领域” (Lovejoy, 1936:15)。

为了厘清观念史的研究范式, 我们有必要同时考虑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相关研究, 因为二者在学术流派上是相通的。具体来说, 尽管说观念史和思想史的学术内涵存在一定差异 (Hutton, 2014), 甚至可以说代表不同的哲学史观念 (Mandelbaum, 1965), 但诸多研究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严格区分 (Lovejoy, 1936; 柯林武德, 1997; Skinner, 2002; 斯蒂芬·柯林尼, 2006)。约翰·格林

(Greene, 1957: 59) 在《思想史的对象与方法》中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拓展为各种“普遍观念和观念形式 (pattern of idea)”。其实, 思想和观念都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只不过思想是观念的高级形式。单就方法论意义上的研究范式而言, 观念史和思想史并无本质上的学术分野, 正如约翰·波考克 (2002: 16) 所说: “无论是‘思想史’还是‘观念史’, 似乎都是一回事: 它们类似于元历史或历史理论, 一种在关于‘思想’和‘观念’如何找到各自位置的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有关历史的性质的研究。”

以利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为代表的“施特劳斯学派”和以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 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构成了思想史研究的两大代表性研究范式, 前者关注文本 (text), 后者则转向语境 (context) (Major, 2005: 477)。这两大学派同样可以视为观念史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路径。具体来说, 施特劳斯坚信思想对应的是一些普遍的“永恒问题”, 并且完全可以超越历史的支配而在语言与经验上浮现出来, 因此强调从文本“细读”中发现思想。在研究方法上, 施特劳斯强调关注经典文本书写中的矛盾、混乱与冲突之处, 因为这里往往储藏着观念的形式与逻辑。施特劳斯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指出, 霍布斯的文本中存在大量的相互矛盾而又令人深思的文字, 而“那些冲突性语言 (contradictory statements) 中往往传递了霍布斯的真实意图” (Strauss, 1952: x)。通过对这些“冲突性语言”的分析, 施特劳斯发现了霍布斯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的近代自然法观念。不同于施特劳斯对于文本的极力推崇, “剑桥学派”则转向一种跨文本的历史语境主义。为了在方法论上把握思想存在并发生作用的历史过程, 斯金纳 (Skinner, 2002: 118) 认为应该跳出文本自身的言说逻辑, “通过对那些非言语力量 (illocutionary forces) 的识别与认同而抵达深层的语境内容”, 进而“在思想家所处时代的总体话语 (general discourse) 系统中思考问题”。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 斯金纳表达了对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观念的深刻推崇。柯林武德指出,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必然表现着行动者的某种思想, 史学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 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 (柯林武德, 1997: 301), 同时也要赋予历史过程以主体内涵, 即“并不是对一个问题不同回答”, 而是要在时代演变的历史语境中回应“不断变化着的问题” (柯林武德, 2005: 63)。总之, 无论何种研究范式, 观念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究观念的起源、存在形式及其历史过程。

如何抵达过去的观念, 又如何发现观念的存在形式, 以及如何处理相关的文

本、经验和材料问题，知识社会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范式和认识路径。<sup>1</sup>具体来说，知识社会学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社会决定理论，核心探讨“人如何实际进行思考的问题”（卡尔·曼海姆，2000:1）。而按照罗杰·豪舍尔（2002:5）的观点，“观念史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显然，观念史研究实际上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是发现并识别观念的存在形式；第二是探寻观念的起源问题；第三是把握观念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和历史逻辑。知识社会学能够有效地回应观念史研究所面临的三个问题：首先，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形态，因此构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次，知识社会学旨在探讨知识的起源问题，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接近观念的社会植根性问题；最后，知识社会学“通过描绘和结构分析的方法，调查社会关系是以什么方式实际影响思想的”（卡尔·曼海姆，2000:271），因而有助于我们在经验与材料维度上把握观念与社会的影响机制和互动逻辑。

然而，尽管曼海姆强调知识社会学作为“经验理论”的认识论问题，但并没有在方法论意义上给出具体的、明确的方法路径和操作过程。本文尝试探索观念史研究的一种可能的修辞学方法路径。然而，修辞学分析过程确立的前提则是相应的知识社会学核心论题的确立。按照曼海姆的理论假设，开展知识社会学研究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知识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存在互动结构。知识与社会的“互动”不仅包括“社会进程对思想‘视野’的本质渗透”（曼海姆，2000:276），还包括知识在社会与历史维度上的作用方式，即“它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中如何作为集体行动的工具实际发挥作用”（曼海姆，2000:1）。罗伯特·K.默顿（2008:618-623）将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概括为因果关系和功能关系，后者则强调知识之于存在的能动作用，因此呼吁“潜在观念的现实化过程”中思考知识的社会影响；第二，知识的基本内涵是观念与思想。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思想问题，而思想的形成过程揭示了“为什么世界恰恰以那样的方式呈现自身”（曼海姆，2000:277）；第三，社会形势变化中存在群体意识的突显。身处群体中的人“力求同他们所属的群体的特征与立场相一致，致力于改变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或使之维持一定既定的条件”（曼海姆，2000:4）。概括起来，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是“观念的社会影响”“观念的生成机制”和“观念的群体意识”。探讨观念史研究的修辞学路径，意味着如何在修辞学意义上回应上述三



个问题，并尝试给出可能的方法路径和操作过程。

不同于洛夫乔伊（Lovejoy, 1936:17）所强调的“从伟大的哲学体系所散播的种子中培育起来的观念”，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一种更为普遍的日常生活中的观念形式，尤其体现为日常生活中那些普遍存在且相对稳定的群体意识、思想碎片或知识单元。为了避免研究流于泛泛而谈，本文强调回到一个冲突性的议题、时空或知识语境中，借助修辞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从观念生成与流变的话语机制来把握“观念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在一个“冲突语境”中开展观念史研究，是考察观念的形成、发生与流动时必须回应的一个发生语境问题。<sup>2</sup>因此，本文立足于“秸秆焚烧”这一冲突性的议题语境，以PM2.5的概念形成及其对应的环境观念作为具体的考察对象，尝试在此基础上发展并提炼出一套相对普遍的观念史研究的修辞学方法路径。

基于此，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如下：第一，为了揭示观念产生的社会变化，本文主要从知识赋权的角度切入，即从赋权的视角来把握观念与社会的“互动”；第二，为了揭示观念本身的话语机制，本文聚焦于观念深层的框架生成原理，特别是从修辞学视角揭示框架生成的微观修辞实践；第三，由于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思想一定是群体的社会意识，而群体意识研究离不开对社会区隔系统的探究（马克斯·舍勒，1999:66），因此本文立足于一个基本的知识社会学逻辑：在观念运行的社会主体互动结构中，观念究竟是“谁的观念”？

## 二、PM2.5：作为赋权话语的意指概念生产

当我们尝试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提取某种共同特征，并形成一定的知识单元时，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概念化的思维模式。概念不仅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构筑单位，同时也构成观念史研究最基本的分析单元（罗杰·豪舍尔，2002：13）。按照金岳霖（1983：335—336）在《知识论》中的观点，观念是相对模糊的，概念则比较清晰，而观念不必是概念，但概念总是观念。很难想象没有概念支撑的观念话语，也很难想象放弃观念憧憬的概念形态。因此，对观念的识别和分析，一种常见的分析方式便是从具体的概念切入，把握具体的概念内涵以及不同概念相互勾连而成的意义网络。

按照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思路，如果一个概念的“出场”建构了特定的“矛盾”（problems）或者“争议”（arguments），并且在人们的观念层面形成某种相对稳

定的群体意识，我们可以说这一概念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其实，“矛盾”与“争议”并不是存在于事物的先天属性和固有结构中，而是经由修辞实践所“构造”的产物。只有当语言符号开始“关注”某一事物，并尝试对其进行命名和表述时，它才能成为一种“议题”。在公共议题建构实践中，概念一直都发挥着“争议制造者”的修辞功能（Myerson & Rydin, 1991:6）。没有概念，就没有表征，相关议题也就失去了认知和传播的符号载体（刘涛，2017：8-9）。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概念是如何完成公共议题的建构，其内在的修辞学原理是什么？

为了在修辞学意义上把握观念的社会影响，我们以“PM2.5”这一具体的概念作为考察对象，探讨概念实践维度上的环境观念生成逻辑及其对公共议题的建构方式。PM2.5是近些年逐渐进入公共视野的一个意指概念，它的“出场”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知识社会学命题。1977年，美国开始检测空气中的细微颗粒含量，并给了细微颗粒一个响亮的学术名称——PM2.5。在PM2.5诞生之前，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相对笼统的“感觉”来接近空气污染问题，但这种“把握”注定是模糊的，有限的，不确定的。因为简单的“空气污染”难以将环境问题建构为一个明确的“争议”，空气污染迟迟未能引起国人的敏感。然而，随着美国大使馆反复发布中国各地的PM2.5指数，这一概念的指涉内容越来越清晰了，而且逐渐进入中国官方的环保话语体系，成为衡量空气污染状况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指标”。PM2.5拒绝个体的感知经验，它的功能和目标就是对空气污染状况进行数据化、指标化、参数化表征。透过PM2.5，原本极度抽象的污染问题瞬间变成了普通公众都可以轻易把握的数字游戏，这不能不说是科学话语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精妙接管。可以说，PM2.5解放了公众在空气污染问题上的话语权力，任何人都可以公开地谈论污染，也可以安全地戏谑并批评政府，建立在PM2.5基础上的批判性话语场域随之生成。可以设想，如果没有PM2.5这一意指概念（ideographs），空气污染依旧可能会逃离公众的经验感知和关注视野，依旧会因为监测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逃离行政话语的问责体系。正因为PM2.5这一概念术语的“出场”，空气污染才作为一个“问题”或“争议”被构建出来，原本笼统而模糊的“空气污染”瞬间上升为一个可以借助知识话语进行精确把握和测量的“雾霾问题”。（刘涛，2015a：54-58）

显然，PM2.5的“出场”建构了“雾霾问题”，不仅赋予了公众认识并界定环境议题的能力，同时也赋予了公众参与环境话语建构与争夺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被精心发明并构造的概念符号，PM2.5是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知

识形态，其生产实践对应的是一种典型的知识赋权行为。知识赋权意味着一种话语形式，它生动地诠释了知识生产的社会影响，尤其是知识社会学特别关注的知识行为深层的社会变化。知识赋权强化了公众的社会参与能力，“对抗性话语”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被生产出来，其结果特别体现为对社会秩序的深层影响，尤其是对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影响。如今，PM2.5已经进入各大政策或法律条文，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重构当前的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2012年2月环保部最新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年9月国务院出台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2013年9月国务院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年1月全国人大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或政策都将“雾霾问题”列入治理对象。可见，雾霾之所以作为一个既定的环境“问题”被建构出来，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既定的法律政策与公共秩序，离不开PM2.5这一概念形态的发明及其在政治场域中的意义实践。

为了更清晰地把握不同概念的修辞能力和作用效力，我们引入迈克尔·迈克吉（Michael C. McGee）的意指概念理论来进一步阐释“观念的社会影响”这一知识社会学命题。不同于一般的符码术语，意指概念服务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目的，是被特定话语专门“拣选”的符号术语。意指概念“致力于以一种高度抽象的符号行为来回应并再现那些模棱两可或界定有误的现实问题”，以期对现实进行完整的“抽象”和“描述”（McGee, 1980:15）。普通概念之所以上升为意指概念，是因为它进入到政治话语序列，如生态环境场域中的“平衡”“进步”“安全”“可持续性”等，国际政治场域中的“自由”“人权”“法制”“启蒙”等。可见，意指概念具有普遍的公共性基础，在公共议题构造上具有不可比拟的符号优势与潜力。

概括来说，PM2.5是一种积极酝酿、传达、生产特定环境观念的意指概念，那里储藏着一个巨大的意指结构。透过PM2.5的意义世界及其变迁轨迹，我们可以抵达一个更复杂的观念世界——底层群体将PM2.5视为一种通往公共参与的抗争符号，资本力量在PM2.5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雾霾经济学”的资本想象力，政治阶层尝试在PM2.5创设的议题框架中重构一套社会治理方案。正因为PM2.5的知识生产功能，人们才能够相对科学而清晰地把握环境问题，环境观念才在修辞学意义上逐渐深入人心。由此可见，PM2.5对应的是一种话语生产行为，它的目的和功能就是以一种生产性的符号途径推进环境观念的重构。正是借助PM2.5强大的议题建构和争议再造能力，社会现实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的领域。因此，立足于意指概念的修辞学分析路径，从知识赋权的维度把握PM2.5的观念内涵以及“观念的社会影响”，

这一分析路径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具有积极的学理基础。

### 三、接合实践与框架生成的修辞原理

如何把握“观念的生成机制”，首先需要厘清观念的存在形态。观念是一种典型的话语形式，特别体现为一种普遍共享的、体系化的理解方式。任何观念的生成，必然伴随着特定的知识形态的生产实践，而意指概念就是被精心建构的一种知识形态。知识作用的结果就是“帮助人们界定什么是基本的常识，什么是合理的认知”（Dryzek, 2005:9）。任何观念体系的形成，往往是特定话语运作的结果。观念分析的基础就是对观念深层的话语形式和内涵的分析。

#### （一）框架形态分析

观念的形成总是受制于特定的框架限制——“框架就是让语言吻合你的世界观，它不仅仅是语言。首要的是观念，语言则承载、唤起这些观念。”（乔治·莱考夫，2013：11）我们之所以会形成特定的观念形态，根本上是因为在知识/话语的维度上激活、挪用或再造了既定的认知框架，从而赋予现实世界既定的理解方式。框架创设了一个巨大的“语义场”，本质上提供了一套有关话语生成的“语境元语言”（刘涛，2014：26）。任何框架的形成，都离不开语言的修辞实践，即框架必然是语言修辞的产物。当一种框架被生产出来，它便悄无声息地征用了某种既定的理解方式，即框架作用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一个团体获得某种授权的意志、计划、希望和前途”（Bourdieu, 1991:191）。乔治·莱考夫（2013：58）将框架推向了观念合法性建构的主导地位，认为框架提供了一种无意识认同方式，其作用就是重新界定事实，赋予现实认知一种强大的领悟模式。正因为观念的深层逻辑是话语，而话语实践必然伴随着特定的框架生产实践，因此观念史研究的重要命题就是对话语实践中的框架机制研究。

只有进入具体的议题语境中，观念才能呈现更真实的话语图景和更丰富的框架形态。为了揭示PM2.5议题语境下环境观念的话语机制及其深层的框架运作机制，本文以“秸秆焚烧”这一冲突性议题作为环境观念研究的议题语境。秸秆焚烧事件创设了一个争议性的话语“场所”，不同社会主体竞相在这里编织自身话语的合法性。透过秸秆焚烧议题深层的话语图景，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社会主体在PM2.5问题上的话语立场以及冲突深层的观念形式。秸秆焚烧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话语图景？我们以大众媒介的相关报道作为话语分析的材料基础，以此探讨观念运作的框架机制。

本文选择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大众媒介关于秸秆焚烧相关议题的报道。在研究思路和方法设计上,本文基于慧科新闻数据库和中国知网全国重要报纸数据库,以“秸秆焚烧”“秸秆禁烧”作为检索关键词,最终选择报道数量排名最前的5家党报、5家都市报和1家行业报的相关报道,最终得到1198条文本对象。<sup>3</sup>五家党报分别是《安徽日报》(198条)、《新华日报》(138条)、《大众日报》(106条)、《河北日报》(105条)和《湖北日报》(82条),五家都市报分别是《华西都市报》(136条)、《半岛都市报》(91条)、《现代快报》(81条)、《楚天都市报》(60条)和《大河报》(56条),一家行业报是《中国环境报》(145条)。

内容分析数据发现,主流媒体在秸秆焚烧事件中主要呈现了六种框架,分别是利用框架(31.7%)、政绩框架(26.4%)、惩罚框架(23.6%)、危害框架(17.0%)、愚昧框架(13.5%)、文化框架(9.4%)。具体来说,利用框架主要介绍秸秆的回收利用价值,强调秸秆如何用于发电、工艺、旅游等项目;政绩框架主要表现政府在秸秆禁烧、火点控制、事故处理等方面的积极作为;惩罚框架主要强调对违反国家规定或引发事故的农民进行惩罚,包括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形式;危害框架主要聚焦秸秆焚烧行为对于环境和日常生活的直接破坏,包括雾霾、交通事故、庄园烧毁等问题;愚昧框架主要反思农民对国家政策的不配合、对雾霾问题的不重视以及对公职人员的直接对抗;文化框架主要强调秸秆焚烧符合已有的文化传统和自然规律,如灰烬可以作为肥料反哺大地,滋养土壤,因而在文化观念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显然,六种框架对待秸秆焚烧的立场和态度是不同的,除了文化框架是站立在农民立场,并赋予秸秆焚烧一定的合理性,其他五种框架均对秸秆焚烧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将其建构为一种落后的、不合规范的、具有一定社会风险的行为事实。

## (二) 接合机制分析

六种框架征用了不同的认知范畴,也就是将秸秆焚烧“勾连”到不同的问题语境中,从而赋予秸秆焚烧行为不同的语义网络,这一过程对应的修辞逻辑是接合(articulation)。按照欧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香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观点,接合也称为勾连,即“一种构建事物与意义之间对应关系的意指实践”(Laclau & Mouffe, 1985:105)。拉克劳用“浮动的能指”来揭示符号与意义之间的随机状态和不稳定结构(Laclau, 1993: 435),而接合实践则尝试从修辞学意义上重新争夺并赋予事物以新的意义系统。接合实践的主要方式是将



意指概念勾连到既定的话语系统中，从而在话语维度上编织意指概念的意义内涵（刘涛，2015b：58-68）。由于每一种话语都是由一系列意指概念聚合而成的一个语义网络，因而意指概念研究“必须在与其它事物的关系中来理解”（McGee, 1980:14）。迈尔森和里丁（Myerson& Rydin, 1991:7）的研究发现，任何一种环境话语都是由不同意指概念相互勾连而成的一个“环境网”（environet）。在秸秆焚烧议题中，主流环境观念的想象力在PM2.5这一意指概念的接合实践中延伸开来。

接合实践的发生过程如图1所示。接合实践既可以理解为不同意指概念的逻辑连接，也可以理解为意指概念和话语网络的意义勾连。具体来说，话语Ⅰ和话语Ⅱ可以视为两个不同的意义网络，意指概念a代表话语Ⅰ中的某个稳定的概念符码，意指概念b则处于话语Ⅰ和话语Ⅱ的意义争夺状态之中。当话语Ⅰ和话语Ⅱ都尝试将意指概念b纳入到各自的话语体系中时，话语冲突便发生了。换言之，理解话语冲突的一种有效方法就是考察不同话语对于同一意指概念的意义建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接近不同话语的框架内涵。比如，环保主义话语和工业主义话语都尝试将“可持续性发展”这一意指概念纳入到自身的话语网络中，但却给出了不同的意义：前者强调以生态保护为初衷的有节制的经济发展，后者强调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生态秩序和资本秩序的合理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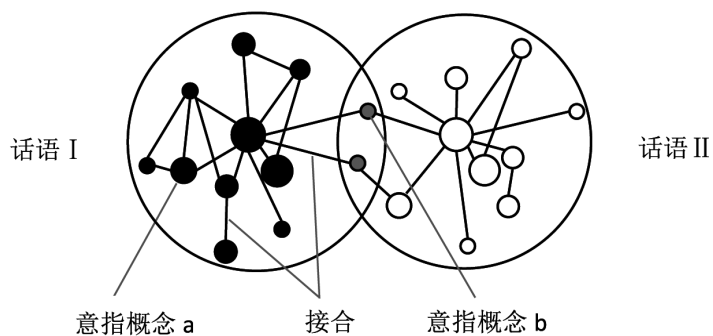


图1：接合实践发生过程示意图

当意指概念进入特定的话语链条中，接合实践便发生了，与之相应的修辞产物则是话语框架。在不同的话语框架及其接合实践中，秸秆焚烧从一个“问题域”进入另一个“问题域”，即在修辞学意义上被建构为不同的“问题”形态。具体来说，在利用框架中，秸秆焚烧被视为一个可以通过科学手段进行认识、改造和治理的科学问题；在政绩框架中，权力主体通过对秸秆焚烧行为的处置来确立政绩话语

的合法性，秸秆焚烧意味着一个政治问题；在惩罚框架中，秸秆焚烧被明确界定为一种违法行为，因而意味着一个法律问题；在危害框架中，秸秆焚烧被视为引发城市雾霾的罪魁祸首，而禁烧成为通往雾霾治理的唯一途径，因此秸秆焚烧意味着一个环保问题；在愚昧框架中，秸秆焚烧被置于现代性语境下的城乡二元对立框架中，而且被视为一种与现代文明话语背道而驰的落后的农村问题；在文化框架中，秸秆焚烧回归到传统的文化哲学与文化地理学范畴，同时被视为一种符合“自然伦理”和“生态哲学”的传统生产方式，因此意味着一个伦理问题。可见，在不同的接合实践中，秸秆焚烧接受不同框架范畴的描述和界定，因而被悄无声息地建构为一个科学问题、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环保问题、农村问题、伦理问题。

不同框架所对应的理解体系是排他的，彼此之间存在明确的认知界限。比如，秸秆焚烧行为是否有益于土壤的再生能力，文化框架和利用框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认知方式。文化框架认为秸秆焚烧是传统刀耕火种的自然延续，并对其合理性给予了充分的文化肯定。利用框架则立足于科学主义话语，尝试从科学维度上揭示秸秆焚烧行为对于土壤的破坏，进而提倡要对秸秆进行科学利用而非直接焚烧的现实价值。《新华日报》的《“禁烧秸秆”为何身陷“治理疲劳”》和《河北日报》的《焚烧秸秆，害人害己》分别挪用了文化框架和利用框架，从而对秸秆焚烧行为给出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话语立场：

有农民朋友告知，焚烧后的秸秆是富含钾肥的草木灰肥料，对中性和酸性土壤特别适合，而且焚烧可以烧死寄生于秸秆的虫、卵、病毒，大大减少下一年的农作物病虫害。

——《新华日报》，2011年6月7日第2版

农业专家则表示，直接将秸秆点燃了事，能直接烧死、烫死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使土壤的碱性提高，并导致耕地板结，直接影响农田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这种做法对农田造成的“烧伤”很难弥补。

——《河北日报》，2014年10月11日第2版

正是基于对六种框架的激活、挪用或再造，秸秆焚烧问题最终被转换或置换为其他性质的“问题”形态，那框架是如何被建构的，其对应的语言学构造机制又是什么？其实，任何框架都是修辞建构的产物，即通过语言的策略性使用而形成了某种具有劝服性的理解方式（Laclau & Mouffe, 1985: 96）。因此，理解观念生成的话

语机制，不仅要回应“框架识别”问题，还要回应“框架生产”问题，即框架如何在修辞学意义上被构造的。

### （三）修辞实践分析

纵观秸秆焚烧事件中的话语图景，语言修辞的标志性产品就是“话语框架”。每一种修辞策略都对应于相应的修辞实践，其功能就是尝试在语言维度上勾勒出某种既定的领悟模式。如何科学而合理地确立框架生成所涉及的具体的修辞实践？本文立足于秸秆焚烧事件中相关报道的具体修辞行为及其策略本身，综合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修辞学和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新修辞学对于具体修辞体裁与策略的划分，在此基础上确立秸秆焚烧事件报道的诸多修辞方式。具体来说，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公共演说传统，将古典修辞学的修辞体裁细化为五种修辞实践：发明（invention）、谋篇（disposition）、文采（elocution）、记忆（memorization）和表达（delivery）（转引自刘亚猛，2004：214）。本文选择“表达”和“谋篇”作为框架机制分析的关照视角，<sup>4</sup>其分别对应的修辞实践是隐喻修辞和故事修辞：隐喻修辞强调借助某种公众普遍认同的理解方式或概念体系来表征某一观点，故事修辞则强调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既定的话语合法化。与此同时，伯克的新修辞学主要是在“沟通”与“认同”的维度上把握修辞学的内涵与特征。他将修辞行为划分为三种具体的认同方式：同情认同、对立认同和误同。本文参照伯克的修辞学观念，其分别对应的修辞实践为悲情修辞、对立修辞和误同修辞。悲情修辞“强调共同的情感来与听众建立亲情关系”，更多地是借助情感化的叙事来实现情绪上的共鸣；对立修辞是一种“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其常见的表达方式是制造一个共同的敌人而实现成员内部的团结；误同修辞被认为是一种“虚假的认同”或“无意识认同”，一般意味着将某种既定的现实错误地理解或置换为个体的某种能力，从而对现状产生认同。（博克，1998：161-163）总之，在对古典修辞学和新修辞学理论资源的批判性选择和吸纳的基础上，本文确立了五种具体的修辞体裁或修辞实践：隐喻修辞、故事修辞、悲情修辞、对立修辞、误同修辞，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揭示秸秆焚烧事件中框架生成的修辞学原理。

五种修辞实践对应于五种不同的劝服/认同机制，其在框架生成中的修辞贡献也是不同的。一种框架的激活与生产，并非依赖于单一的修辞实践，而往往是多种修辞实践的综合结果。如果对秸秆焚烧事件中1198篇报道所对应的六种框架形态和

五种修辞实践分别编码，然后观察框架形态和修辞实践之间的逻辑关联。<sup>5</sup>交叉列联表卡方检验数据显示：尽管说每一种框架都综合使用多种修辞实践，但某些框架总是偏向于特定的修辞实践，而且存在显著的相关强度（见表1）。具体来说，利用框架更多地使用故事修辞和误同修辞，政绩框架更多地使用隐喻修辞和悲情修辞，惩罚框架更多地使用对立修辞，危害框架更多地使用对立修辞和故事修辞，愚昧框架更多地使用误同修辞和故事修辞，文化框架更多地使用悲情修辞。

表1：“框架形态”与“修辞实践”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隐喻修辞	故事修辞	悲情修辞	对立修辞	误同修辞
利用 框架	%(n)		24.5% (293)			21.9% (262)
	X <sup>2</sup>		374.053			347.854
	Cramer' s V		.559			.539
	p		.000**			.000**
政绩 框架	%	27.5% (293)		19.0% (228)		
	X <sup>2</sup>	374.053		205.753		
	Cramer' s V	.559		.414		
	p	.000**		.000**		
惩罚 框架	%				17.8% (213)	
	X <sup>2</sup>				218.951	
	Cramer' s V				.428	
	p				.000**	
危害 框架	%		20.7% (248)		29.4% (352)	
	X <sup>2</sup>		143.602		703.057	
	Cramer' s V		.346		.766	
	p		.000**		.000**	
愚昧 框架	%			9.2% (110)		20.1% (241)
	X <sup>2</sup>			10.302		392.653
	Cramer' s V			.093		.573
	p			.002**		.000**
文化 框架	%			17.2% (206)		
	X <sup>2</sup>			331.701		
	Cramer' s V			.526		
	P			.000**		

注：%为总百分比，X<sup>2</sup>为卡方值（df=1），Cramer' s V为相关强度值，p为显著度。

可见,尽管说六种框架铺设了PM2.5时代环境观念的基本图景,但框架本身的合法性,却是多种修辞实践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仅以政绩框架为例,对其修辞学构造机制予以阐释。探究政绩框架的生成原理,其实就是要回答接合实践发生的微观语言修辞机制,即秸秆焚烧事件是如何作为一种政绩资源而承载并凸显政府的治理能力。接下来我们主要从隐喻修辞和悲情修辞两个维度切入,把握政绩框架生成的修辞机制。

第一,在隐喻修辞实践中,一系列成熟的认知意象和概念系统被激活和挪用,以此限定并确立了我们的理解方式。所谓隐喻,意味着用一种认知系统来代替或表达另一种认知系统,即将始源域的某些因素或属性映射到目标域,从而达到认识目标域的目的。伯克指出,当我们从喻体的特征体(character)角度来把握并理解主体时,其实就是在提出一套有关主体的新观点(Burke, 1969:503)。在秸秆焚烧的叙事图景中,隐喻修辞的常见策略就是征用了“战争”修辞,即将面向秸秆焚烧的政府治理视为一场战争。如果说秸秆焚烧治理是一场战争,采取最严厉的惩处行为便是一种自然而热的选择。在政绩框架的修辞体系中,“硬仗”“狼烟”“攻坚战”“狙击战”“主动仗”“游击战”“集结号”“严防死守”等概念符号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其特点就是在战争修辞框架中强化政府治理行为的高效与正确。

《全力以赴打好秸秆禁烧这场硬仗》《一个督查员的“禁烧战争”》《西安部署秸秆焚烧阻击战》《今秋秸秆禁烧战“第一把火”要挨惨》《守护蓝天的攻坚战》《泗县全面打响秸秆禁烧攻坚战》《张贴公告2500余张构筑秸秆禁烧“防火墙”》等标题直接启用了“战争”修辞,从而在战争隐喻体系而非法律认知体系中建构了秸秆焚烧行为的环境违法本质。例如,《河北日报》在《衡水将秸秆禁烧责任分解到地块》中直接挪用了“攻坚战”“钉钉子精神”“严防死守”“一把火”等概念系统,并将其与秸秆焚烧的危害性建立联系,从而将战争化的对抗思维引入环境治理的认知体系:

衡水市委、市政府提出,要破除认为衡水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轻,抓大气污染防治感觉没抓手、没抓头,甚至不值得、不舍得的松懈思想,以钉钉子的精神打好秸秆禁烧、散煤治理、控制道路扬尘、防止偷排偷放四个攻坚战……把责任分解到村、组、地块,加强巡查,严防死守,确保不着一把火,不冒一股烟。

——《河北日报》,2014年10月12日



第二，在悲情修辞实践中，官方话语抛弃了相对理性的法制话语，转而使用的是一套悲情化的语言体系，其特点就是极力渲染秸秆禁烧的治理之苦，以此建构政府形象的“弱势感”，从而在情感维度上编织秸秆禁烧话语的社会认同基础。悲情修辞抛弃了传统修辞学擅长的理性话语体系，转而诉诸“感性的力量”。一般来说，悲情修辞是弱势群体最擅长的话语行动：底层群体往往借助下跪、自残等表演式的身体叙事方式来制造事件，以此引发社会的同情，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公共领域中“天理”的伦理生产（刘涛，2016b）。然而，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官方话语，反倒招募了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悲情修辞方式，将自身建构为一个饱受秸秆焚烧之苦“弱者”，以此俘获社会公众的情感认同。例如，《新华日报》在《秸秆禁烧，不能只靠“干部防”》中将“秸秆禁烧攻坚战”描绘成一场“猫鼠游戏”。正是通过对悲情修辞的使用，“弱者”在语言实践中被悄无声息地生产出来，“猫鼠游戏”中的“猫”成了一个需要被同情的对象：

记者看到，被烧得黢黑的土地冒着热气，沟旁的小树被烧得碳化。本就酷热难当，再加上火烧火燎，村干部们衣服都被汗打湿。“我们村早上7点点名，镇里凌晨12点点名，一直看到夜里4点，一天就吃两顿饭，就在地头吃煎饼喝矿泉水。早上露水重，烧不起来，能睡两三个小时。我们村已花了两三万元，还向镇里交了6000块钱的保证金。”

——《新华日报》，2013年6月24日

#### 四、谁的赋权：观念深层的群体意识形态分析

当不同的框架被生产出来，我们如何把握框架深层的群体意识形态？秸秆焚烧之所以作为一种“争议”被生产出来，不能不提到城市话语与乡村话语的地缘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是在框架维度上体现并深化的。具体来说，在六种框架形态中，利用框架、政绩框架、惩罚框架、危害框架和愚昧框架具有明显的精英立场，更多地代表了现代性语境下城市阶级的生态审美诉求，而文化框架则携带着明确的农村阶层的话语立场。如果说秸秆焚烧会引发一定程度的雾霾，那对农村遭遇的雾霾影响要远远大于城市，可为什么农民不关心头顶上的蓝天？因为在农民那里，相对于真实的现实生计，环保还不足以作为一种“观念”进入农民的“问题清单”。因此，秸秆焚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城市审美话语与乡村生计话语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而冲突的本质则指向转型中国的复杂语境。

从这个意义上讲，秸秆焚烧事件创设了一个争议性的话语性场域，它剥掉了官

方意识形态一直以来构建、修复并维护的城乡之间的水乳关系或和谐状态，使其不得不面对彼此几近遗忘的真实：这里不再有过往城市阶层极为擅长的怀旧话语，不再有政治话语倾心雕饰的和谐图景，也不再有资本话语竭力缝合的压制关系和正义问题，被主流话语掩饰多年的城乡矛盾最终在PM2.5时代的雾霾面前“露出真容”。如果说PM2.5创设了一个特殊的时代语境和认知系统，秸秆焚烧则是一块通往城乡关系认知的“试金石”。正是在秸秆焚烧这里，环境观念不再是纯粹生态学意义上铁板一块的集体观念，而是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地缘特征与阶层特征。至少在主流媒介铺设的观念图景中，携带着城市阶层旨趣取向的话语框架占据了主导性地位，而代表乡村阶层利益诉求的文化框架仅占9.4%，在强大的城市阶层话语图景中成了绝对的弱势。

可见，建立在PM2.5这一意指概念基础上的环境观念并不是一种毫无偏见的整体性的群体意识，而是携带着明确的阶层属性，且存在一个地缘意义上的解释向度。回到前文所述的“赋权”话语维度，尽管说PM2.5的“入场”制造了一种集体性的环境敏感，而且作为一种赋权话语将城市和乡村的利益诉求有效地捆绑在一起，但不得不承认，这种“结合”是松散的，是分层的，是不稳定的，一旦出现诸如秸秆焚烧这样的“刺激物”，阶层之间的一体感和连带性便遭遇瓦解。然而，当不同阶层不得不在生态美学问题和现实生计问题面前做出抉择时，主流环境观念集体转向了城市，赋予了城市话语极大的合理性。

因此，雾霾问题根本上是一个城市问题，而PM2.5归根到底还是城市人的意指概念。如果说PM2.5是一种赋权，那这种赋权具有显著的阶层内涵，即对城市阶层的赋权。在雾霾笼罩下的社会冲突体系中，PM2.5毫无遮拦地展现了其“亲都市话语”的阶层内涵。如果对比APEC会议、G20峰会、全国两会期间对秸秆焚烧的严加治理事实，国家权力极为敏感的恰恰是城市而非乡村上空的PM2.5。当雾霾问题进入总体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城市问题便意味着一种逼真不过的意识形态问题。相应地，PM2.5时代的环境观念吻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规划。在PM2.5所呈现的环境“争议”面前，面对秸秆焚烧引发的是是非非，政绩框架、惩罚框架、危害框架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环境认知范畴，更多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对秸秆焚烧行为合理与否的“事实宣认”。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面对主流环境观念所呈现的PM2.5图景，我们如何理解“主流”的内涵？在秸秆焚烧议题制造的语义场中，“主流”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形态意义维度，而是选择性地转向并表现为地缘意义上的空间问题，并最终成为“城市话语”的代名词。如果说PM2.5的“出

场”意味着一种赋权，那赋权的对象、方式和效果则存在一个深刻的社会分层系统。

在PM2.5制造的冲突性议题中，不仅意指概念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具有一定的阶层差异，其社会文化实践（sociocultural practice）同样呈现出显著的阶层特征。<sup>6</sup>话语实践分析强调从意识形态维度把握意指概念的阶层内涵，社会文化实践分析强调从具体的物质实践维度把握意指概念与现实活动的作用机制。我们不妨从社会流动（social flow）这一具体的实践形态来把握PM2.5的社会文化实践。PM2.5是一种典型的危险话语，但每个阶层应对危险的能力和方式是不对等的——精英阶层具有更大的流动能力，可以通过移民等方式摆脱雾霾的困扰，而普通阶层则被迫困于原地，默默地承受着雾霾的肆意伤害。换言之，面对流动的雾霾危险，精英阶层恰恰以“流”的形式存在，最终通过“流”的方式摆脱了危险的追击和支配（刘涛，2016a：94）。其实，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早在阐释危险观念时就已经指出了危险存在与影响的阶层属性，并认为“阶级社会和危险社会存在着很大的相互重叠”：“危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危险是依附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颠倒了的方式：财富在上层集聚，而危险在下层集聚。”（贝克，2004：36）显然，危险是被精英阶层命名和生产的一种不确定性话语，其生产行为本身又嵌套于一个时代总体性的政治经济学生产模式中（刘涛，2016a：95-96）。换言之，PM2.5时代的社会文化实践呈现出明确的流动性差异，而流动性问题的深层逻辑则是一个阶级批判命题。

总之，将阶层分析引入观念史研究，一方面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空间，另一方面也拓展了观念史研究的批评视野。PM2.5议题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观念赖以存在并生成的意指概念并非一个毫无阶层偏见的概念形态，而往往反映并体现着特定阶层的利益和旨趣话语。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阶层”的内涵和构成？阶层显然是一个与阶级密切关联的概念。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更多地是一个资本和权力概念，然而危险语境下的社会区隔系统更为复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发展阶级的内涵以及阶级分析范式。在PM2.5制造的一系列结构性的不确定性图景中，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话语，专业知识、主体声誉、生活机会、市场地位等问题同样被推向了阶级话语范畴，而后者又恰恰是韦伯（Max Weber）的阶级分析观念所关注的内容。罗丝玛丽·克朗普顿（Rosemary Crompton）在《阶级与分层》中对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分析观念给出了一定的辨析：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是由经济位置决定的，“阶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关系中的

剥削和支配”，而韦伯的阶级概念则与专业知识和市场机会有关，更多地强调的是一种阶级处境，即“阶级处境反映了市场上的不同‘生活机会’（life chance）”，而生活机会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阶级形态（克朗普顿，2011：58-59）。因此，开展观念史研究的意指概念批判，有必要整合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概念，从而关注更为多元化的阶级存在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具有普遍分析基础的阶级分析范式。诚然，在中国当前的政治语境和话语体系中，“阶层”相对于“阶级”而言内涵更为丰富，具有连接马克思和韦伯阶级话语的概念整合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本文选择“阶层批判”这一表述。

### 五、结语与讨论：通往观念史研究的修辞学方法路径

本文以PM2.5时代的环境观念作为考察对象，从修辞学意义上分别回答了文章开头所提出的观念的社会影响、观念的生成机制、观念的群体意识，并对具体的修辞学分析过程和操作方式给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其对应的修辞学方法论分析过程如表2所示。首先，就观念的社会影响而言，修辞分析的核心内容是“修辞资源”选择和“话语形式”识别。文本立足于意指概念这一基本的修辞资源形态，从话语赋权的视角来把握PM2.5的“出场”所产生的社会变化；其次，就观念的生成机制而言，本文将大众媒介文本视作观念表征的文本对象，认为观念生成离不开特定的框架生产实践，相应的修辞学分析过程包括框架形态分析、接合机制分析、修辞实践分析。框架形态分析主要指社会主体征用了何种认知框架，从而限定并引导人们的认知方式。接合实践分析主要指社会主体是如何建立不同事物之间的认知关联，也就是将PM2.5问题勾连并转化为具有普遍社会认同基础的其他性质的问题。修辞实践分析主要指框架建构的语言学修辞原理，亦即在修辞学意义上回答接合行为发生的话语过程及其心理认知逻辑；最后，就观念的群体意识而言，观念史研究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观念的群体构成和群体意识构成，即在修辞学意义上回答意指概念的阶层性批判问题。本文一方面立足于意指概念的话语实践分析，另一方面又综合意指概念的社会文化实践分析，从而根据观念生成的框架特征与过程回答了“谁的观念”这一阶层认知问题。

基于对PM2.5议题的观念史分析，本文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修辞学分析范本，但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一种相对普遍的观念史研究的修辞学方法论框架，依然需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思考和拓展。立足于“观念的社会影响”“观念的生成机制”和“观念的群体意识”这个基本的观念史研究框架，有必要对表2中所提供的

观念史研究框架与模型进行必要的完善，使其具有相对普遍的适用性。

表2：秸秆焚烧议题语境下观念史研究的修辞学分析过程

观念的社会影响		观念的生成机制		观念的群体意识	
修辞资源	话语形式	框架形态	接合机制	修辞实践	阶层批判
意指概念	知识赋权	利用框架	科学问题	故事修辞	城市立场/ 精英立场
				误同修辞	
		政绩框架	政治问题	隐喻修辞	
				悲情修辞	
		惩罚框架	法律问题	对立修辞	
		危害框架	环保问题	故事修辞	
				对立修辞	
		愚昧框架	农村问题	故事修辞	
				误同修辞	
				对立修辞	
		文化框架	伦理问题	隐喻修辞	乡村立场/ 农民立场
				悲情修辞	

具体来说，基于PM2.5所提供的基本分析模型，通过在修辞学意义上把握观念的修辞资源、话语形式、框架形态、接合机制、修辞实践、阶层批判，以此把握观念史研究的修辞学方法路径。第一，在修辞资源的识别上，意指概念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认知路径。意指概念就如同一面镜子，在那里我们可以窥视到观念史研究特别关注的两大命题：物质现实对意指概念的生产过程以及意指概念所产生的社会影响；<sup>7</sup>第二，在话语形式的理解上，本文主要从知识赋权的话语维度探讨观念与社会的影响方式与互动机制，但知识赋权并非通往“观念的社会影响”的唯一话语形式。在具体的观念史研究中，依然有必要结合具体的社会事实，创造性地发现并选择更有效更多元的话语认知方式；第三，在框架形态分析上，本文更多地依赖于具体的文本对象。其实，并非所有的观念都存在一个明确的文本化的分析对象，也并非所有的观念都是以一种成熟的语言形式存在，而如何对非语言性的社会性文本（如事件、空间、仪式）开展相应的框架识别工作，同样需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拓展和创新；第四，在接合机制分析上，本文关注的是一种议题是如何从一个“问题域”流动到另一个“问题域”，对应的接合过程不仅强调意指概念之间的接合方式分析，同时强调意指概念是如何被勾连到既定的话语体系中。当一个意指概念进入到某一话语体系中，它是如何改变既定的语义结构，或者说既定的意义网络发生了



何种变化,这是后续研究需要迫切回答的理论命题;第五,在修辞实践分析上,观念史研究需要回答的核心命题是,观念所对应的认知框架是如何在修辞学意义上被建构的?其实,本文对具体修辞策略的识别和归纳,更多地是在语言维度上把握框架的生成原理。然而,如今的视觉文本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文本形态,如何把握视觉话语形成的框架形态,即在修辞学意义上把握“视觉框架”(visual frame)的内涵特征和生成机制,而这必然涉及到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的分析方法和实践(刘涛,2016c:5-28);第六,在阶层批判探析上,观念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路径就是尝试揭示观念本身的阶层属性,并进一步回答“谁的观念”这一命题。诚然,观念运行的社会背景和阶层构成愈加复杂,而且观念本身也处于一个流变过程,因此,阶层批判分析不仅要在共时意义上把握不同阶层的观念差异,还要在历时意义上动态地把握观念的流动和争夺过程。

(责任编辑:陈辉)

### 注释 [Notes]

1. 英国思想史学者斯蒂芬·柯林尼(2006:8)列出了观念史研究可供借鉴的四种理论范式: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洛夫乔伊的“观念-单元”史、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学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2. 在观念史的两大研究范式中,尽管分歧主要体现为是否要正视并确认历史的主体性,但都强调在一个冲突性的知识结构、议题背景或语境关系中来把握观念的形式与流动——无论是“施特劳斯学派”对文本冲突的直接追问,还是“剑桥学派”对思想冲突的历史考察。
3. 由于大量报道都是关于秸秆禁烧政策的介绍以及政策性的火点通报情况,此类新闻占据了相当数量,考虑到研究问题的针对性,这部分报道予以剔除。
4. 中世纪中叶以来,五种修辞实践开始受到相邻学科的挤压,逐渐出现了失衡状态,比如“记忆”已经退出修辞研究范畴,“文采”成为文学语言的专属范畴,“发明”“表达”和“谋篇”成为最核心的三大修辞传统。
5. 一篇报道往往会呈现不同框架,同时也会使用多种修辞实践。因此,本研究将六种“报道框架”和五种“修辞实践”分别作为独立的变量进行编码。在编码方式上,本研究对两名编码员进行科学训练,反复解释每一个变量的特征与内涵,然后对50份随机选择的报道进行内容编码。通过对每一个变量的编码员信度进行检验,总体的编码信度较高,所有变量的Kappa值均大于0.70。总体而言,六种“报道框架”变量比五种“修辞实践”变量的编码员信度Kappa值略高。
6. 本文参照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 1995:59)提出的批判话语分析(CDA)的三个向度——文本(text)、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和社会文化实践(sociocultural

practice), 主要从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维度切入, 把握意指概念的阶层批判的视域和内涵。话语实践分析强调从意识形态批评维度把握意指概念的阶层内涵, 社会文化实践分析强调从具体的物质实践维度把握意指概念与现实活动的作用机制。

7. 关于意指概念的修辞分析, 可以借助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来把握概念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关于详细的修辞分析原理和方法路径, 参见拙作(刘涛, 2015a)。

###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金观涛 & 刘青峰(2010). 《观念史研究: 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北京: 法律出版社.  
[Jin, Guantao & Liu, Qingfeng. (2010). *History of ideas research: Construction of the key political terms in modern China*. Beijing: Law Press.]
- 金岳霖(1983). 《知识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Jin, Yuelin. (1983). *Theory of knowledg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卡尔·曼海姆(2000).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Mannheim, K. (2000). *Ideology and utopia*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9) .]
- 柯林武德(1997). 《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Collingwood, R. G. (1997). *The idea of history*.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6) .]
- 柯林武德(2005). 《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Collingwood, R. G. (2005). *An autobiography*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6) .]
- 肯尼斯·博克(1998). 修辞情景, 载于肯尼斯·博克等. 《当代西方修辞学: 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顾宝桐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urke, K. (1988).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In K. Burke etc. (Eds.), *Contemporary western rhetoric: Speech and discourse criticism* (pp.155-168) (Tra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3) .]
- 刘涛(2014). 环境公共事件的符号再造与修辞实践——基于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的符号学分析. 《新闻大学》, (06), 24-31.  
[Liu, Tao. (2014). The symbolic reproduction and rhetoric practices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events: A semiotic case study of Lanzhou tap-water pollution event. *Journalism Bimonthly*, (06), 24-31.]
- 刘涛(2015a). 意指概念: 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 《现代传播》, (9), 54-58.  
[Liu, Tao. (2015a). Ideographs: An exploration on rhetorical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Modern Communication*, (09), 54-58.]
- 刘涛(2015b). 接合实践: 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1), 58-68.

- [Liu, Tao. (2015b). Articulation practices: An exploration on rhetorical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social science)*, (01),58-68.]
- 刘涛(2016a).风险、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批判:通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南京社会科学》,(5),91-99.
- [Liu, Tao. (2016a). Risk, flows and the criticism of uncertainty: Rethinking the critical paradigm of Marxism class analysis. *Nanjing Social Science*, (5),91-99.]
- 刘涛(2016b).视觉抗争:表演式抗争的剧目结构与符号矩阵.《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4),5-15.
- [Liu, Tao. (2016b). Visual resistance: the repertoires structure and semiotic matrix of performing resistance.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4),5-15.]
- 刘涛(2016c).西方数据新闻中的中国:一个视觉修辞分析框架.《新闻与传播研究》,(2),5-28.
- [Liu, Tao. (2016c). China in western data journalism: Searching for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visual frame based on visual rhetoric.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02), 5-28.]
- 刘涛(2017).新概念 新范畴 新表述: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的修辞学观念与路径.《新闻与传播研究》,(2),6-19.
- [Liu, Tao. (2017). New conception, new category, and new expression: A rhetorical interpretation for innovating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02), 6-19.]
- 刘亚猛(2004).《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
- [Liu, Yameng. (2004). *Seeking for the power of symboliz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western thoughts of rhetoric*.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罗伯特·K.默顿.(2008).《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Merton, R. K. (200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Trans.)*. Nanjing: Yili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8).]
- 罗杰·豪舍尔(2002).序言 (pp.1-47), 载于柏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Hausheer, R. (2002). Preface, In Isaiah Berlin (ed.)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Trans.)*. Nanjing: Yili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9).]
- 罗丝玛丽·克朗普顿(2011).《阶级与分层》(陈光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Crompton, R. (2011).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3rd ed.) (Tran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8)]
- 马克斯·舍勒(1999).《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Scheler, M. (1999). *Problems of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Tran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0).]
- 乔治·莱考夫(2013).《别想那只大象》(闫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Lakoff, G. (2013).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Trans.)*.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4)]
- 斯蒂芬·柯林尼(2006).什么是思想史, 载于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pp.3-8).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Collini, S. (2006). The meaning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Ding Yun (ed.). *The meaning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pp.3-8).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乌尔里希·贝克(2004).《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 [Beck, U. (2004).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Trans.). Nanjing: Yili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6)]
- 约翰·波考克(2006).什么是思想史, 载于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pp.16-19).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Pocock, J. (2006). The meaning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Ding Yun (ed.). *The meaning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pp.16-19).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Trans.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rke, K. (1969). *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ng, T., Wang, J. & Chen, C. (1994). News as socia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changing worldview of Chinese national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4(3), 52-69.
- Diggins, J. P. (2006). Arthur O. Lovejoy and the challeng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7(1), 181-208.
- Dollimore, J., & Sinfield, A. (1994). *Political Shakespeare: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2nd edition)*.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Dryzek, J. S. (2005). *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2<sup>nd</sup>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 Greene, J. (1957). Objectives and method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4(1), 58-74.
- Hutton, S. (2014).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40:7, 925-937.
- Laclau, E. (1993). 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In Thomas Docherty (ed.), *Postmodernism: A Reader*(pp.329-34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aclau, E. & Mouffe, C.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ovejoy, A. O. (1936).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jor, R. (2005). The Cambridge School and Leo Strauss: Texts and contex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8(3), 477-485.
- Mandelbaum, M. (1965). The history of ideas,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History and Theory*, 5, 33-66.
- McGee, M. C. (1980). The “ideograph” : A link between rhetoric and ideolog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6(1), 1-16.
- Myerson, G., & Rydin, Y. (1991). *The language of environment: A new rhetoric*.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 Skinner, Q. (2002).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auss, L. (1952).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Its basis and genesis* (Trans. Elsa M. Sinclair),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